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

# 中国古代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  
中国古代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5004-8884-2

I. ①改… II. ①中… III. ①中国—古代史—研究 IV. ①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5551 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张玉霞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张汉林

---

|      |                                                       |     |                   |
|------|-------------------------------------------------------|-----|-------------------|
| 出版发行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                   |
| 社 址  |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 邮 编 | 100720            |
| 电 话  | 010-84029450 (邮购)                                     |     |                   |
| 网 址  | <a href="http://www.csspw.cn">http://www.csspw.cn</a> |     |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
| 印 刷  | 北京新魏印刷厂                                               | 装 订 | 广增装订厂             |
| 版 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 印 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710 × 1000 1/16                                       |     |                   |
| 印 张  | 28.5                                                  | 插 页 | 2                 |
| 字 数  | 495 千字                                                |     |                   |
| 定 价  | 49.00 元                                               |     |                   |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              |
|-------------------------|--------------|
|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   | 卜宪群(1)       |
|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先秦史研究 .....     | 徐义华(15)      |
|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秦汉史研究 .....     | 杨振红 徐歆毅(52)  |
|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  | 戴卫红(94)      |
|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 .....   | 牛来颖(157)     |
|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宋史研究 .....      | 江小涛(179)     |
|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辽金西夏史研究 .....   | 关树东(195)     |
|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元史研究 .....      | 刘晓 党宝海(217)  |
|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明史研究 .....      | 万明 张金奎(229)  |
|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清史研究 .....      | 林存阳 朱昌荣(253) |
|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   | 张海晏(293)     |
|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   | 杨艳秋(321)     |
|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文化史研究 .....   | 王 艺(345)     |
|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   | 邱源媛(365)     |
|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 | 刘中玉(391)     |
|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  | 成一农(406)     |
|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敦煌史学研究 .....    | 杨宝玉(433)     |

#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卜宪群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会议。这次会议确定的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以及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三十年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都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历史学是一门与现实有着密切联系的学问。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步入了繁荣昌盛的新阶段，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中国古代史也同样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下面我从四个方面就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 一 研究环境的变迁与人才培养

史学研究从来都与其所处时代的环境不可分离，中国古代史也不例外。所谓时代环境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该时代的社会变化对史学研究产生的影响；二是该时代的学术环境对史学研究产生的影响。前者反映的是学术与社会的关系；后者反映的是学术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众所周知，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学界面临着非常艰难的境地。“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首先是从古代史领域中点燃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等许多问题也和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相关。在这场空前浩劫中，许多著名史学家遭到迫害，中国古代史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受到严重歪曲，学科建设在这10年中陷于停顿。因此，批判“四人帮”给史学界造成的羞辱是当时中国古代史学界的当务之急。史学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虽然绝大多数史学家并不认同“四人帮”的错误观点而与之进行斗争，但他们在这10年里荒废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研究工作不能正常进行。迅速肃清“四人帮”的余毒，把他们带来的损失夺回来，是压抑在当时史学工作者心中的迫切愿望。

但客观地看，当时的中国古代史学界还面临着更深层次的问题。首先，人才培养的断层和学科建设的停顿，导致研究力量上严重不足，后继乏人；其次，对理论的简单化、教条化、公式化的理解以及对史学功能的片面性认识，使中国古代史研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存在着研究领域狭窄，研究方法单调，缺乏对中国历史自身特点和规律的把握以及对海外研究状况闭塞等诸多问题；再次，由于社会转型和史学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包括中国古代史在内的整个历史学受到了所谓“危机”论的冲击。这些依然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古代史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也使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步履维艰。新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从时间上来说是从“文化大革命”之后开始的，但积累的问题却由来已久。

随着社会转型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深入人心，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术环境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回顾三十年来的历程，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

### （一）人才培养有了制度化的保障

1977年恢复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已经录取了两届学生，研究生招生也在1978年恢复，其中就有不少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学生入学接受专业训练。五四运动以来的一批史学大家在新时期之初还硕果仅存，新中国成立前后崛起于史学界的一批学者尽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但由于他们在学术成长的过程中大都接受了20世纪前半期许多前辈的亲炙，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多人学贯中西，文史兼长，学术生命仍然风华正茂。新中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一批学者尽管受到很多干扰，但由于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对唯物史观有着真诚、科学的信仰，时值中年，学术创造力方兴未艾。恢复高考以后的学子们正是在这种学术传承环境与氛围中受到教育和培养，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今天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 (二) 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有了长远的发展规划

1979年初在成都召开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汇集了来自全国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出版部门的280多位代表,是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的一次盛会。这次会议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展望未来,对历史学科建设与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研究,讨论、修正并落实了八年规划(1978—1985)。<sup>①</sup>此后中国古代史各专业研究会的成立,历史大辞典、大百科全书历史部分的编撰,历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各断代史、专题史的重点研究方向,都与这次规划会议有关。特别是各断代和专门史研究会的成立,至今仍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推动作用。在中央新成立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领导下,1983年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历史科学规划会议,首次将规划项目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被列入规划的中国古代史的一些项目,如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戴逸、王戎笙主编的《清代通史》和《清代人物传》,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张政烺、周绍良负责的《敦煌文书整理研究》(汉文部分),唐长孺负责的《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和《1972—1974年出土居延汉简整理研究》,林甘泉主编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等,具有重要价值。《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后改为《中国经济通史》)也由古代史规划小组在“六五”期间启动。这两次规划会议及其成果从指导思想、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重点项目研究导向上,对开创新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sup>②</sup>1991年6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下设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负责制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这一举措意义重大而深远,多年来,该机构设置课题指南并进行相关课题资助,对包括中国古代史在内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有着重要推动作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至今为学术界所推崇,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古代史的研究方向。1980

<sup>①</sup> 参见周自强《我国历史学界的一次盛会——记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6期。

<sup>②</sup> 关于长沙史学规划会议情况本文参考了周年昌同志的未刊稿《对两次史学规划会议的回忆》。

年恢复活动的中国史学会和各省、自治区的史学会长期以来也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推进作出了贡献。国家重点投入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清史编纂工程等都属于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中的课题。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和各大学的历史学院（系），是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科体系完善和学术研究前进的核心力量，其中一些有特色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基地、中心在各地逐步形成。

### （三）开放的信息交流渠道已经形成

新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无论在方法、手段和研究领域上都不再是封闭式的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对外交流已经开始。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及国外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信息通过翻译、介绍等各种渠道被大陆学者所认识和了解。例如1979年创刊的《中国史研究动态》从第1期开始，几乎每一期都有国外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情况，成为当时直至现在大多数学者了解大陆以外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主要渠道。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交流渠道的畅通，越来越多的学者走出了国门，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外及香港、台湾地区学者进入内地。各类国际学术会议的举行，网络信息化的发达，使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资源共享成为可能。随着开放的深入，香港、台湾及国外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不再是简单的信息介绍，一些重要的史学名著也被系统地翻译介绍过来，如《剑桥中国史》以及众多的各种专门性的中国古代史著作。现在，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中外学者的研究可以说是站在同一起点上了，学术研究的地域性差别已经大大缩小。

### （四）学术研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大为改善

新时期，将史学简单的视为政治工具的做法被纠正，<sup>①</sup>极“左”思

---

<sup>①</sup> 胡乔木在1980年4月8日《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道：“马克思主义认为，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政治不是目的，它主要是实现各个历史时期经济目的的手段，同时也是实现各个历史时期其他社会目的的手段。社会主义的政治，是实现劳动人民经济文化目的的手段，因此毛泽东同志一向教育我们为人民服务。我们从来不说也不可能说人民为政治服务，那就颠倒了主从关系，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科学可以脱离政治，政治是实现人民经济文化需要最重要最强有力的手段……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应该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活动的向导。”

潮受到批判。马克思主义不再作为标签被随意张贴。对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教条化、公式化的理解遭到摒弃。科学对待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发挥其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的应有作用,是中央对包括中国古代史研究在内的历史学的期望,而重点是中国古代史。<sup>①</sup> 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全社会的广泛重视。相比较于其他各种史学研究方法,唯物史观在解释和阐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道路上更加具有说服力。因此,抛弃了极“左”思潮干扰后的学术界,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唯物史观具有了更加科学的历史地位。同时,各种具体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包括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都被广泛运用于探讨宏观和微观的中国古代历史问题,极大地推动并丰富了我们关于古代历史的认识。由于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家对人文学科的投入不断增加,各类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机构得以建立,课题研究经费得到更充分的保障,研究者的经济待遇也明显提高,这是新时期中国古代史研究得以繁荣的重要保障。

---

① 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经常强调全党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要求全党读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不要犯骄傲自满的错误。他还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革命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邓小平同志也告诫全党:“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江泽民同志更是多次说到要加强历史的学习。他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一文中指出:“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在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中,他把这个思想表达得更加明确:“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经验中不断开拓前进。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取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痛苦。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做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最近在中南海学习“历史课”结束后讲道:“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提高治国理政的才干。”

## 二 研究领域的拓宽与学科体系的完善

由于环境的变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出繁荣昌盛、生机勃勃的局面。无论是断代史还是通史、专门史,其突出特点是研究领域的深化和拓宽,学科体系构建逐步完善,研究成果丰硕。鉴于本世纪初已经有很多文章对新时期的研究成果做过总结,也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不再重复,仅从学科发展的宏观角度做一点简单的归纳:

### (一) 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研究在各断代史领域向纵深方向发展。考古新发现和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使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道路问题受到关注,并取得一定的成就。各时期政治制度史的各个层面,如皇权、机构、职官、仕进、考课与监察、法制、文书、军事、行政管理、礼仪、外交、阶级与阶层、国体与政体、政治人物评价等问题都有了新的推进,大都有一部或数部专著出版。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也进入研究视野。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不再是静态的描述而是力图从动态的角度把握整体的演变过程,并将制度史与政治史结合起来考察。多卷本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和各类断代政治史、制度史也相继出版。历代中原王朝的政治史是研究重点,但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史也受到关注。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研究被学者们重视,从而开阔了政治史研究的视野。军制史不再简单地被作为政治史的一个部分而是有了更深入的发展。相关断代的军事史和军事通史也不断问世。政治史研究是传统史学、近现代史学的重点,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累,新时期的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不仅继承了其中的许多优秀传统,还在理论方法、研究视角上有了更多的突破,是中国古代史各专门史研究中发展最快、优秀成果最多,也是最成熟的领域之一。

### (二) 经济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前,经济史的研究相对比较繁

荣，所谓“五朵金花”大都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有关。<sup>①</sup>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一些重要的经济史研究机构和刊物创立，大批研究资料整理出版。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方法、理论都有了新的变化，传统经济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继续得到关注，但研究重心的转移也十分明显。对中国古代经济的整体性认识增强，如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点，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关系，传统经济与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社会经济形态，城镇与市场经济，前近代中国的经济结构，“三农”等都是新时期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经济史中各专门史研究，区域经济史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与经济史相关的环境史、城市史等都有了开创性的研究。<sup>②</sup>

### （三）社会史研究

开始于20世纪初的社会史研究在新时期获得广泛关注，成为一个热门研究领域。其内容部分可以与过去的社会史研究接轨，但在理论方法，研究视角上都有了新的变化。社会史的学科定位还有不同看法，但这三十年来取得的成就应当是公认的。社会组织与结构、宗族、家庭与人口、婚姻形态、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势力、风俗信仰、秘密结社、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代表性的论著问世。专门性的社会史、社会通史、区域社会史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疾疫史、灾荒史、性别史、乡村史以及底层社会群体的研究被重视。田野调查与口述史也开始了初步的尝试。<sup>③</sup> 以“国家与社会”为理论分析框架的研究模式近年来广泛渗透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影响有逐渐扩大之趋势。其所预设的理论前提、核心内容、逻辑话语，在建构新的历史解释模式和研究范式，进而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与历史视野以及形成新的问题意识上，都令人瞩

① 参见吴承明、李伯重《谈百家争鸣——〈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20周年笔谈》，《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② 相关资料可参见李根蟠《二十世纪中国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林甘泉《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林甘泉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相关资料可参见郭松义《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目。它直接推动了中国古代史中的长时段历史、基层社会组织，社会结构变迁等具体研究与宏观研究的展开，其含义已经不是狭义的社会史所能够涵盖的。唐宋变革论的再次被关注与此不无关系。社会史研究的相关机构和刊物也都是在新时期创建的。

#### （四）思想文化史研究

思想史在新时期所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简帛资料的发现极大地推进了先秦思想史的研究，特别是儒家道家思想的早期形态研究。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有了新的评价，当然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如何认识还不一致。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明显拓宽，关注的热点增多，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有相当一批高水平的论著问世。<sup>①</sup>当然新时期的思想史还存在着研究发展方向的问题，就思想史谈思想史还是将思想史与政治史、社会史等学科相结合来研究，仍然有意见分歧，但这种分歧有利于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而不是阻碍。文化史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之初，是在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过程中产生的，取得了诸多成就。新时期的文化史热潮是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开始的，显然也带有时代的特色。从1978年开始，相关研究机构和刊物先后创办，目前已经形成规模。新时期的文化史研究尽管经历了泛文化的浪潮，有“文化”的虚热成分夹杂其中，文化史研究的对象还人言言殊，但无论是以实证为基础的文化史研究，还是以援引新的理论方法开拓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域、获得文化史研究的新认识，都获得了全面丰收。三十年来，出版了多部文化通史，展示了中华文化演变的整体面貌；各断代文化史的出版，极大地丰富并深化了对各时期历史的认识。地域文化史和少数民族文化史的整理与研究，是新时期文化史研究新的走向。<sup>②</sup>改革开放使中华传统文化经历着深刻的转型，人们更多的注意到文化与历史、文化与现实的关系，文化的“软实力”越来越被重视，文化史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

① 相关资料可参见张海燕《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期。

② 相关资料可参见周积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

### （五）其他诸学科

除了上述四大领域之外，中国古代史的其他许多分支学科也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在民族史研究领域，不仅各断代民族史中关于民族起源、民族融合、民族政权、民族人物、民族矛盾、民族关系、民族社会性质、民族文化与思想等问题得到深入探讨，民族通史研究也成果丰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点得到广泛认同。民族史籍的整理和民族考古发现是新时期民族史研究的亮点。中外关系史研究在新时期有了显著增强。新文献的发现和考古资料的出土促进了该学科的基础研究。我国古代与域外的陆路、海路交通，与中亚、西亚、东南亚、东北亚、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等相关方面的研究十分活跃。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内涵在不断扩展。史学史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学科建设在机构设置、人才培养、刊物创办等“硬件”上大为改善，对史学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功能的认识有了新的深化，史学史在文本研究、断代研究、人物研究、史学思想史研究、史学批评研究、史学与社会关系研究、少数民族史学研究、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等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sup>①</sup> 历史地理研究在新时期有了长足进步。在传统沿革地理研究领域重要成果众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公开出版，一些重要的历史地理辞书问世。历史人文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军事与交通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历史科技地理等分支学科的发展，为历史地理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sup>②</sup> 近年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主体的研究队伍，综合全国力量，在边疆史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新时期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逐步形成，在历史文献学理论、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藏书学等领域都取得了丰厚的成果。<sup>③</sup> 历史人物研究虽然不构成一门独立学科，但却是新时期古代史研究中成绩突出的一个领域，仍然值

① 相关资料可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下）》，《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② 相关资料可参见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http://www.confucianism.com.cn/html/lishi/1221723.html>。

③ 相关资料可参见蒋宗福《新时期中国文献学研究综述（1978—2005）》，<http://xb.mnu.cn/zhuanYe/2006122093235.asp>。

得一书。无论是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和方法，还是历史人物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较之前有了长足进步，而有些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处理历史人物概念化、简单化的方法受到摒弃。最后，断代史各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新时期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总体成就以断代史研究的深入为代表。从先秦至明清，综合性的断代史编撰和各断代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专题史研究成绩巨大。不仅填补了许多过去的研究空白，也显示出研究者独特的视野和学术个性。各时代的文献整理对推进断代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以断代史为依托的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吐鲁番文书学、徽学在新时期成为国际性的显学，敦煌学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状况得以改变。

### 三 理论视角的转换与研究方法的更新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开展的，传统史学方法虽有遗存，但主流是从唯物史观中抽象出来若干基本原则并运用于古代史研究，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历史人物评价的方法等。史学自身的理论与方法被忽视。“文化大革命”10年，阶级斗争理论演变成为唯一的研究方法，甚至影射史学也粉墨登场。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正本清源，对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和近代史学研究方法的重新认识（梁启超的新史学，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胡适的进化论，傅斯年的史料即史学论，顾颉刚的历史层累构造论，以及实证方法等），对外来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引入，等等，使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手段与研究范围有了诸多更新。呈现出如下特点：

其一，与中国古代史相关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得到深入和加强。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问题，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遗产的批判与继承问题，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的道路问题，中西历史比较问题，“封建”名实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前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及其发展水平问题，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问题，“三农”问题，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等等，认识都得到进一步的深

化。这些问题的提出一方面是由于新时期理论视角的转换和学术内在规律发展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社会现实的需要。当然上述有些问题不限于中国古代史，但大都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不可分离。

其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由于中国古代史的独特地位和史料优势，往往使其首先成为各种各样新的史学研究方法的试验田。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原本属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系统论、控制论就被用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和周期性问题。同样属于自然科学的数学方法也被用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形成计量史学，用于对一些重大问题的量化处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一些方法，如心态史学方法也被用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上人物的心理，并进而对该时期的历史发展作出新的解释。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如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中的研究方法，也被借鉴或援用到古代历史研究中来。日新月异的遗址发掘和出土文字材料，使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空前紧密。历史研究中的一般方法论受到更多的关注，如比较史学方法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得到广泛的运用，在比较的内容、比较的手段与方法上都比之前更为科学。实证与考据方法在新时期再次受到广泛重视，一大批运用实证和考据方法取得的成果是新时期史学的重要成就之一。“回到乾嘉”口号的提出和“国学热”的兴起，实证和考据方法都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sup>①</sup> 破除了教条化的唯物史观仍然是新时期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指导性理论和方法。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唯物史观和具体的史学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愈益明显，古代史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也更加突出中国历史的自身特点。

其三，外来史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相结合。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古代史研究无论是学科分类还是理论方法，都深受外来史学思想的影响。如上述实证史学的方法就来自于西方。新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也与外来史学的影响密切相关。具体说，一是外来史学研究的新视角开拓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领域，如环境史、医疗史等。而在中国古代史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领域，外来史学的影响都十分普遍。二是外来史学研究方法为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所借鉴。如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比较史学、心理史学等成为最受

<sup>①</sup> 参见侯云灏《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史学月刊》2004年第7期。

中国学者关注的几个西方史学流派。<sup>①</sup> 三是共同研究、交流和对话的平台初步形成。无论在基础史料考证, 还是在中观、宏观问题上, 中外古代史学家都可能有了共同的话语。当然, 外来史学研究方法亦存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状况, 需要我们冷静地分析接受。

## 四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未来发展

史学研究的阶段性划分是由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决定的, 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使史学呈现出阶段性的演变。但是, 史学发展也往往与该时期的社会发展密不可分, 社会发展不仅为史学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环境, 而且也为历史认识提供了新的视角。无论就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还是史学发展的社会环境而言, 这 30 年都是一个值得认真总结和回顾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究竟如何评价意见恐怕还不能一致, 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但它以深厚的学术底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丰硕的研究成果, 必将会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 作为与现实有密切关系的历史学更是如此。中国古代史是一门积累深厚的学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史成就的取得与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对外开放、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大环境下, 当代中国史学家既秉承了本民族优秀的史学传统, 又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外来史学理论与方法, 在学术的原创性追求上, 在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的关系上,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满足社会对历史文化需求上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前景广阔。

改革开放还在深化, 中国古代史研究也将会迎来一个百花盛开的春天。首先, 对若干重大问题的关注还将持续。突破原有单一理论模式深化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积极成果, 学者们既立足于新的考古发现总结, 又借助于新的理论概括, 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 这对于解释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有益的。这些

---

<sup>①</sup> 邹兆辰:《新时期以来对中国史学影响较大的几个西方史学流派》,《江西社会科学》2004 年第 1 期。

问题显然还没有统一的认识,研究还将深化。但有关概念内涵的辨析以及在这个问题上如何突出中国历史自身的特点,应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唐宋变革问题也是如此。学者们既从更广阔的角度探讨了唐宋变革的具体内涵,也对唐宋变革的性质提出了质疑,这样的思考是富有建设性的。在这一范式的启发下,学者们以大的视野将汉至唐,宋至明之间的历史联系起来进行综合性的考察,或者将相邻朝代之间的历史进行贯穿性思考,对于揭示长时段的社会变迁提供了新视角。前近代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土地所有制形式等经济史上的重大问题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也都将会有更多的进展。社会形态的演进方式以及“封建”名称概念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也不仅仅是学术概念规范的问题,而是与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相关联的。这个问题的再次提出与争论,既说明学者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精神,也反映了某些新的理论动向。相关问题的争论肯定还将持续。其次,受外来史学方法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变化等现实背景的影响,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视野与领域还将拓宽。如婚姻家庭、宗族史、性别史,灾害史、疾疫史,基层政权组织、社会组织的构建与职能的分析研究还将深入。人口史、环境史、“三农”问题的重视与关注,不仅形成了经济史、社会史乃至文化史新的学科生长点,也反映了学者们力图从历史的角度总结经验,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的问题意识。这种状况仍将持续发展。再次,以新材料带动新问题的研究将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各断代、专门史一个重要的学科生长点。甲骨文、金文还时有发现,数十万枚的简帛还有相当一部分尚未整理出版并且新发现方兴未艾,敦煌吐鲁番文书,西夏文书,徽州文书,墓志碑刻以及各种民间文书,域外汉籍珍本的新发现、新整理都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性资料。建立在这些资料基础上的研究,是新时期中国古代史很多领域中最为突出的成就之一,也将会吸引更多学者的关注。最后,摆在史学家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下,解放思想,破除教条,不仅要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提出研究课题,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特点,而且要在研究方法上体现出中国特色。老一代的史学家在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相结合上作出了杰出贡献,新时期历史学的理论发展方向则是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实现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古代史学科体系的问题,新时期的